

亂世、情感與非典型親密關係*

——論海外華文女作家黃美之戰後小說的離散者群像

羅詩雲

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戰爭與近代台灣社會的生成密不可分，除關乎戰時歷史記憶的建構與拆解，尚需併同觀照戰後復員時期隱蔽且廣延的社會內戰問題。戰爭不僅激化近代台灣大眾面臨國境空間、身分認同或是地域流動等衍變，更重新塑造了私人身體與情感結構的實踐樣態，而蘊含戰爭遺緒作用的文化意義。本文研究對象為華文女作家黃美之（1930-2014），其歷經中日戰爭、國共內戰與戰後台灣戒嚴統治等戰爭或準戰備情境，且是白色恐怖孫立人案之情感與政治層次上的受難者。她的文學書寫反映戰爭所留下的遺緒與國家暴力的傷跡，尤其是女性於戰爭亂世與政治布局下的移動境遇和主體形構。基此，本文以黃美之的戰後小說集《沉沙》（2005）、《烽火儷人》（2010）為討論素材，析論戰爭離散者之人物形象、生活日常與非典型親密關係敘事，以觀察作家對性別角色期待與標準生命經歷的主體抵抗。本文一則形構戰爭離散歷史世代的眾生相，一則析論女性作家生命記憶與文學重述間自我揭露的能動性，亦可得見戰爭遺緒對離散者各式情感關係的解構與女性主體性建構的引力。

關鍵詞：黃美之、《烽火儷人》、戰爭、非典型親密關係、離散者

* 本論文為國科會計畫「『戰時中國』再現：終戰後自中國來臺、返臺作家的戰爭敘事與青少年創傷」（編號：112-2410-H-004-177-MY2；執行期間：2023.08.01~2025.07.31）之研究成果。初稿曾以〈亂世、情感與非典型親密關係：論北美華文女作家黃美之戰後小說的離散者群像〉為題，宣讀於台灣女性學學會 2024 年度研討會（2024.10.05）。論文投稿期間，承蒙審查委員惠賜多項建設性意見，謹致以誠摯謝忱。

Turbulent Times, Emotions, and Atypical Intimate Relationships:

Exploring the Diasporic Characters in the Post-war Novels of Overseas Chinese Female Writer Huang Mei-zhi

Lo Shih-Yun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separably linked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Taiwanese society not only involves 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wartime historical memory but also the attention to the hidden yet pervasive forms of internal social conflict during the post-war demobilization period. In addition to intensify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general population of modern Taiwan regarding national boundaries, identity, and regional mobility, war also reshaped the practices of individual bodies and emotional structures, which are embedded in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war legac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overseas Chinese woman writer Huang Mei-zhi, who experienced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Chinese Civil War, and the post-war martial law period in Taiwan. She was also an emotional and political victim of the White Terror incident involving Sun Li-jen. Her literary works reflect both the legacy of war and the scars of state violence,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women's mobil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subjectivity amid wartime upheaval and political structuring. Accordingly, this paper examines Huang's post-war novel collections, *Sunken Sands* (2005) and *War-torn Couples* (2010), as primary sources, analyzing representations of war diaspora, everyday life, and narratives of non-normativ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In doing so, it examines the author's resistance to gendered expectations and normative life trajectories.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collective portrait of a generation shaped by war and displacement, while also analyzing the agentic self-disclosure that emerges through the interplay between women writers' lived memories

and their literary retelling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how the afterlives of war reconfigure affective relations and exert a formative pull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emale subjectivity among diasporic subjects.

Keywords: Huang Mei-zhi, *War-torn Couples*, War, Non-normative Intimate Relationships, Diaspora



一、前言：後戰爭的離散者情感

20 世紀的中國歷經軍閥混戰、中日戰爭、國共內戰與世界冷戰，致使文學敘事充斥著大量戰爭記憶。台灣當代國族問題是東亞戰爭遺緒的一環。戰爭遺緒是持續作用的文化現象，於戰火停歇後以不同形式滲入日常，更與歷史記憶和文化敘事相互作用，形塑時間上在戰爭之後與對戰爭進行批判反思的「後戰爭」語境。¹ 島嶼台灣不但承接前述歷史脈絡影響，且需併同觀照戰後復員時期隱蔽且廣延的社會內戰背景。² 戰爭與政治暴力之禁錮與逃離的離散經驗，深刻影響此間大眾的生命際遇與記憶書寫，鬆動且重構了認同結構。此外，私人身體與情感結構的實踐樣態也被重新塑造，承載著戰爭遺緒所滲透的文化意涵。本文研究對象為海外華文女作家黃美之（1930-2014），原名黃正，湖南長沙人，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歷史系、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肄業。1949 年來台求學，開學前擔任孫立人將軍秘書、女青年大隊生活輔導組副組長。1950 年與姐姐黃珏一同因孫立人案受到牽連，以「過失洩漏職務上所知悉之軍事機密消息」的罪名囚禁十年，為台灣白色恐怖的受難者。獲釋後，曾任國立復興電台編輯、內政部勞工司國際勞工組員。1963 年離開台灣，隨美籍外交官夫婿派駐亞非各地；1972 年偕夫返美定居，在加州郵局服務多年後退休。³

黃美之自 1960 年代起投身創作，活躍於北美華文文壇，曾任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LACWA）副會長，也是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世界華文作家協會成員。2001 年她用冤獄平反補償金在洛杉磯成立德維文學協會，推動海外華文文學活動。作品散見於台港星馬及美國華文報紙雜誌，創作包括散文和小說。散

- 1 戰爭遺緒是在空間或日常生活中，因戰爭所衍生或未完之種種生命樣態，以創傷經驗、身分認同、意識形態或話語形構等形式施予個人生命的規訓，而轉化為另類的戰爭樣態。梅家玲，〈後戰爭〉，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台灣理論關鍵詞》（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03），頁 159-160。
- 2 林果顯認為國民黨控制下的中華民國從未脫離戰爭狀態，戰後的戰時體制構築於抗戰國家總動員和反共內戰動員戡亂所構成的法律體系，1945 至 1949 年台灣在法理上無縫接軌的維持戰時體制。林果顯，〈戰後台灣的戰時體制（1947-1991）〉，《臺灣風物》58 卷 3 期（2008.09），頁 135-146。
- 3 作家黃美之的生平介紹，參見曾巧雲，〈黃美之〉，李瑞騰總編輯，《2014 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5.12），頁 148；朱滋源、吳美慧訪問，吳美慧紀錄，〈黃正女士訪問紀錄〉，陳三井、朱滋源、吳美慧訪問，吳美慧紀錄，《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09），頁 71-84。

文書寫個人生活見聞，亦抒發旅外遊子情懷，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台政治冤獄的心路陳述；小說集《沉沙》（2005）、《烽火儷人》（2010）收錄篇章略有重疊，以動人筆觸道出戰爭亂世中的歷史苦難。黃美之歷經中日戰爭、國共內戰與戰後台灣戒嚴統治等戰爭與準戰備情境，也是白色恐怖孫立人案情感與政治層次上的受難者。她的文學結合了史學觀點與個人經歷，反映戰爭遺緒與國家暴力的傷跡，尤其是女性於戰爭亂世與政治布局下的移動境遇和主體形構。且黃美之的生命經歷與敘事取向，有別於1960、70年代興起的海外華文離散書寫潮流。相較於留學生文學所強調的放逐、懷鄉或移民文學揭示的認同危機，黃美之一貫地以親密關係政治為寫作核心，敘寫以歷史史實或親身經驗為底本的民國故事，開闢戰時中國與白恐創傷之情感敘事，以及映射新居地的社會狀況；再者，相比於同世代華文女作家的於梨華、吉錚和孟絲，其源於旅美經歷的無根失落和婚戀糾葛之主題意識，黃美之小說緊扣對日抗戰、國共內戰和冷戰政治的歷史背景及生存語境。其寫作意識蘊含強烈的歷史敘事意識與政治感知力，展現出她對戰時女性主體與國族現實的複雜思考，拓展華文女作家的敘事向度。⁴

黃美之的華文寫作具濃厚自傳色彩，前行研究集中論述其散文對白色恐怖受難經驗的描寫。如趙淑俠〈生命是往前走的——淺談黃美之的《傷痕》和王仙的《情之鍾》〉評述《傷痕》以回憶與敘述往事為主軸，呈現個人傷痕和歷史真實面貌；張錯〈回眸〉將黃美之敘事劃分虛實交錯的虛構層面與禁錮回憶的現實層面；趙彥寧〈流放的政權與流亡的身體：論五零年代公領域中的主體、物、與性／別〉由流亡身體與物品依附的關係解析黃美之散文，表述了主體與物的互構；小說的討論可見《烽火儷人》出版時施卓群、朱天文、趙淑敏、喻麗清等人的評述，另有發行人華文衡〈出版後記〉譽之為戰亂年代的中華民族史；叢甦〈無常亂世中的悲喜滄桑——略評[烽火儷人]〉總評此書結合真實跡痕與文學臆構，

4 1960、70年代海外華文女作家小說仍受父權規範影響，以男性分身傾訴母國思念。吉錚小說可見個人問題的探討，於梨華突破道德窠臼展現女性意識，孟絲同樣寫有女學生群像，但美國經驗仍作為小說主要背景，回歸華人家庭的傳統價值。范銘如，〈嫁出國的女兒：海外女作家的母國情結〉、〈來來來·去去去：六、七〇年代海外女性小說〉，《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08），頁111-125、127-149；侯作珍，〈台灣海外小說的離散書寫與身分認同的追尋——以六〇到八〇年代為探討中心〉，《文學新論》6期（2007.12），頁27-42。

文筆樸實真摯，刻劃人性良善的人物；《沉沙》則見華文作家曉亞〈序——砂礫的光華〉書序，評價其寫出歷史世代之苦難經歷，呈現人性光輝與黑暗。明鳳英《她們的時代：民國女子訪談錄》為重要參考資料，收錄黃美之接受專訪並親自修改訪稿的紀錄，呈現民國女性的時代心境與中國社會實貌。⁵ 整體而言，評論大抵呈現對黃美之小說「人性」描繪的關注，及其人物所處背景之戰時中國歷史。

親密關係是相互依存且長時間持續的多樣性動態關係，牽涉了關係同伴者間的自我揭露與互動回應，特殊歷史情境往往致使其於日常生活發展出不同形式。⁶ 而戰爭情境的影響不單存於戰場，更深入至日常生活，持續以不同方式影響女性的生命情感、經濟、家庭與身體自主權。⁷ 若考量《烽火麗人》被文友定位為亂離時代中女性情感的白描書寫，則適足回應近代中國戰爭、社會內戰及世界冷戰下親密關係的非典型敘事，呈現戰爭如何影響女性生命經驗及其敘事的問題。⁸

-
- 5 趙淑俠，〈生命是往前走的——淺談黃美之的《傷痕》和王仙的《情之鍾》〉，《明道文藝》253期（1997.04），頁158-162；張錯，〈回眸〉，《聯合報》，2012.11.16，D3版；趙彥寧，〈流放的政權與流亡的身體：論五零年代公領域中的主體、物、與性／別〉，何春蕤主編，《性／別政治與主體形構》（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04），頁79-97；施卓群，〈美人滄桑——將軍夢迴《烽火麗人》迴響系列一〉，《旺報》，2010.06.29，C15版；朱淑珍，〈讀罷半掩卷——清淚已三行——《烽火麗人》迴響系列二〉，《旺報》，2010.06.30，C15版；趙淑敏，〈漣漪·大動盪中的不倫纏綿——筆友給黃美之的信——《烽火麗人》迴響系列〉，《旺報》，2010.08.16，C11版；趙淑敏，〈漣漪·大動盪中的不倫纏綿——筆友給黃美之的信——《烽火麗人》迴響系列〉，《旺報》，2010.08.17，C15版；喻麗清，〈夢裡花落〉，《旺報》，2010.08.17，C15版；華文衡，〈出版後記〉，黃美之，《烽火麗人》（台北：智庫公司，2010.06），頁358-364；曉亞，〈序——砂礫的光華〉，黃美之，《沉沙》（台北：躍昇文化，2005.03），無頁碼；叢甦，〈無常亂世中的悲喜滄桑——略評[烽火麗人]〉（來源：<https://psc.is/8udk84>，檢索日期：2024.04.24）（原文寫於2010年8月26日）；明鳳英，〈不與紅塵結怨的烽火麗人——黃美之〉，《她們的時代：民國女子訪談錄》（台北：釀出版，2020.01），頁161-206。
- 6 林以正、黃金蘭，〈親密感之日常社會互動基礎：一個縱貫式的研究〉，《中華心理學刊》48卷1期（2006.03），頁45；蔡明璋，〈導讀〉，林恩·傑米森（Lynn Jamieson）著，蔡明璋譯，《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台北：群學出版社，2002.10），頁vi-vii。
- 7 民國史學者呂芳上指出抗戰史必須納入婦女活動的討論，家庭問題為戰時社會提供另面歷史的討論角度，且牽涉複雜的法理、道德與人情因素，其爭議往往持續至戰後。美國女性主義學者 Cynthia Enloe 進一步運用女性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檢視美國對伊拉克戰爭中的性別權力運作。她指出戰爭是一種深度性別化的政治實踐，主張應回到女性的日常生活經驗，揭示戰爭如何滲透至生活細節，並重塑性別角色與社會權力結構。呂芳上，〈另一種「偽組織」：抗戰時期婚姻與家庭問題初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期（1995.08），頁97-121；Cynthia Enloe, *Nimo's War, Emma's War: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the Iraq Wa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 8 戰爭讓家庭結構和社會網絡產生變化，知識男性的戰時記憶文本較少提到家庭，多著墨於戰時文藝活動或個人生活感想，女性相對偏重家庭。趙淑敏，〈漣漪·大動盪中的不倫纏綿——筆友給黃美之的信——《烽火麗人》

小說集《沉沙》、《烽火儷人》所收諸篇，背景從清末乃至 1960 年代，包括在中國、台灣、美國、非洲、東南亞等地故事，表現戰亂年代中青年世代的流散苦難。作家筆下的群像經歷「熱戰」（在中國的國共抗戰）與「冷戰」（在台灣的白恐經歷）的不同戰爭形式。本文以敘事學（Narratology）為分析框架，透過對人物類型、情節結構與非典型親密關係的分析，探討黃美之對女性角色期待與典型生命軌跡的顛覆話語。論述架構由「熱戰」通往「冷戰」：以《沉沙》七則短篇與〈流轉〉中篇小說觸探抗戰離散史的人物境遇、情感關係與社會圖景，再就〈烽火儷人〉中篇小說探究冷戰下女性離散者的情感依附與創傷敘事，論述作家主體、身分及親密關係間的糾結。⁹ 本文一則討論戰爭離散世代的眾生相；二是析論女性作家生命記憶與文學重述間自我揭露的能動性展現。本文研究意義除了梳理戰時後方記憶及其文學敘事外，亦可得見戰爭遺緒對離散者各式情感關係的解構與女性主體性建構的引力。

二、殘缺病弱的離常眾生

小說集《沉沙》、《烽火儷人》出版於 2000 年後，此時點回應孫立人案與黃美之白恐冤獄皆獲平反的轉折。¹⁰ 《沉沙》收錄的七則短篇，背景包括清末乃至一九六〇年代；《烽火儷人》收有六篇小說，〈烽火儷人〉、〈流轉〉為新作品中篇，自傳性強，其他四篇與《沉沙》篇章重複，這些篇章新增序言、重新分段、標號或修訂敘述，主線情節不變。人物包括修女、老兵、情報員、渡假美軍、官員子女、匪諜遺孤、戰亂平民。黃美之認為小說是作者感情的架構，也需要時代事實作為基礎，故其小說除表現特定的時代背景，也點描一時代下的人文思想與際遇。¹¹ 一如作家自述她是正宗的「民國產品」，歷經中日戰爭和國共鬥爭的逃

迴響系列），《旺報》，C15 版；游鑑明，〈處處無家處處家：中國知識女性的烽火歲月〉，《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3 期（2014.06），頁 4-16。

9 離散經驗非由本質決定，離散者的身分透過差異與變形持續生成。戰爭情境為黃美之及其小說人物帶來變數，使其身分建構呈現動態化的調整與重組。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Edited by Jonathan Rutherford, Lawrence & Wishart, 1990, p. 225.

10 程懷澄，〈代序〉，黃美之，《深情》（台北：躍昇文化，2002.05），頁 6。

11 黃美之，〈後記——一份解釋一份情〉，《沉沙》，無頁碼。

難生涯，致使心理長期的不安。¹² 因此，其筆下的人物莫不展現殘缺病弱或者失能、性格缺陷的主體樣貌，被歷史肢解的時代傷痛透過症狀發聲，病殘失能的生命狀態以各種模態映射人物（或言作者）的苦難與創傷。承此，本節將由作家短篇論述戰時人物的類型形塑及其意涵。

黃美之短篇小說構圖類別有二：一為據真實人物所發展，包括〈仙人掌物語〉、〈糖水與同情〉、〈走出奇幻〉、〈烽火歸人〉；二為描述家族流變者，包括〈月白刀傳奇〉、〈追殺 落日〉。〈仙人掌物語〉原型為黃美之囚禁桃園天牢期間的獄友周志英，抗戰時為情報局特務，身分暴露後囚於秘密監牢中。〈仙人掌物語〉結構分為三部分，情節圍繞於民國抗戰前後的商戶趙氏家族。大哥趙子英生活腐化、個性軟弱，因傷人而宣稱參加革命逃至廣東，後非法入境美國工作。小妹趙子菁則違逆父命赴上海讀書，抗戰期間為受日人監視的特務。《烽火麗人》所收之同篇故事改名為〈心中的仙人掌〉，新添二哥遭日人槍斃卻仍受子孫祭拜的為國犧牲情節，襯托大哥與妻女生死相隔、無人聞問的慘況。一生未婚的趙子菁收養姪女趙秀萍，並向種植的仙人掌日夜祈禱，召喚客死異鄉的大哥魂魄。無論是〈仙人掌物語〉或〈心中的仙人掌〉的「仙人掌」都指涉了人、情感與傷痛。其包括墓塚上種植仙人掌的趙子英，還有趙子菁、趙秀萍各自對手足、父親的親情聯繫，以及失去至親的生命傷痛：「心中卻總有番刺傷的酸痛，正好像有時她在修剪仙人掌時，那仙人掌的刺札了她的手一樣。」¹³ 仙人掌的刺表徵了姑姪二人的內心創傷，是戰時生命不完滿的殘缺和遺憾。

〈糖水與同情〉主角原型亦為作家獄友，抗戰情報員在戰後改換士兵身分來台。在眾人返鄉探親的浪潮下，主角處於中國的元配妻子玉蘭與在台再娶的妻子雪嬌之間進退不得，也牽引出情報工作時的記憶。因政治鬥爭被留在中國的元配是老兵內心的瘡疤，也是戰爭歷史造就的傷痕：「他很少夢見她，若夢到她，總是見她苦兮兮的樣子，醒後也就不願再多去想她，正是本能的避免碰觸那傷疤。」（〈糖水與同情〉，頁 43）此篇小說時空橫跨戰前與戰後的中國，妻子玉蘭先

12 明鳳英，〈不與紅塵結怨的烽火麗人——黃美之〉，《她們的時代：民國女子訪談錄》，頁 174。

13 黃美之，〈仙人掌物語〉，《沉沙》，頁 20。凡正文所援引之《沉沙》諸篇小說引文，皆於文末直接標示篇名與頁碼，不另作註。

因掩護丈夫參與南方革命軍而遭婆婆冷待，後又因丈夫奉命返鄉組織被軍閥當局逮捕，致使產後受驚；抗戰期間，更因丈夫的特工身分被日軍拘押與凌虐，身心遭受深重創傷。這些非人遭遇令玉蘭變得寡言且消沉：「她一向就是整潔的人，不像是瘋了，只是臉上沒有一點血色，兩隻眼睛張得大大的沒有一點光彩，她手中端著一盞一明一滅的油燈，看去倒像幽靈。」（〈糖水與同情〉，頁 56）此後，玉蘭更患上了肚子痛的頑疾，唯有神父的藥水能鎮定病症：

糖水，同情……她一向就沒得過什麼同情溫情，但她付出的卻很多很多。……偶爾回去，給她一份短暫的驚喜，卻長久的把她留在孤寂的思念裡，到後來更讓她一人承擔教養三個孩子的責任。她在日本人手中所受的苦刑，一直到在西安住定後，她才斷斷續續的吐了出來，在老家受到冷淡和那種孤獨無援的哀傷，卻從不曾傾訴過。只是那次，剛到西安不久，她喊著肚子痛，雙手按著肚子，大概有些厭煩她那種雙手按著肚子的神經樣子，他就說：「誰要你自己用剪刀去扎。」（〈糖水與同情〉，頁 58-59）

玉蘭的肚痛象徵近代中國大眾歷經戰亂的集體傷痛，然滿懷國家大義的主角面對妻子的病痛卻是缺乏同理的責難，此處凸顯夫妻關係的不和諧和持續的國族歷史傷痛。另若細究實為糖水的藥水有效的原因，竟為神父施予玉蘭的關懷與安全感，於此便能釐清玉蘭的痼疾乃源於心理創傷。然進一步思考玉蘭創傷因素，源頭可分為國共內戰與抗戰所構成的動盪環境，以及丈夫執迷於革命信念與政治熱情所造成的情感壓迫。

〈走出奇幻〉原為黃美之於 1965 年發表的首篇小說〈生命的奇幻〉，背景為抗戰時周佛海一家的故事，情節結合作家生命經驗。散文〈劃清界線〉有相對應的記述，可與小說互相參照，表現出作家創作的基底意識是融會己身戰後政治受難經驗，而重新對民國抗戰史的人性與生存處境展開省視：「我所以會突然欣賞到『劃清界線』這一語彙，只因我心中老不能確定在某一件事上，是否我曾犯

了勢利眼，一種我最不屑為的俗氣人格污染。」¹⁴ 黃美之所言的「人格污染」，意指年少的她忽略了情感、道德掙扎的因素，僅憑藉著國族公義、時事輿論主觀評判周佛海妻子、兒女為國家不忠之人，而與之疏遠的態度。個人存亡情欲的選擇，實是人性的現形時刻。¹⁵ 爾後歷經十年繫獄的黃美之，出獄後碰壁的社會生活始讓自己醒悟年少的不通曉世事，不練達人情。緣此，〈走出奇幻〉算是篇自我批判的懺情小說。篇首敘述保持心靈潔淨的修女，實有其過去歷史方造就現今模樣，引導讀者同理審視人物的過往經歷。

貫穿〈走出奇幻〉的是一幅名為「生命的奇幻」的畫作，黃美之以畫比喻時代，亦喻人。畫裡陰霾滿天的肅殺氛圍如民國戰局，凌亂倒影為故事中的破碎家庭，擱淺的船則映射人物的悲劇性際遇：「那畫倒象徵她母親強烈的性格、父親的野心，或者就算是這時代的寓言吧。」（〈走出奇幻〉，頁 23）修女瑪琍安原是生活優渥的權貴千金，自己崇拜的父親執著於權力與理想，後因漢奸身分獲罪，母親沉淪於資本股票市場。自己則輾轉生活於南京、上海、香港，失去家庭倚靠的她只得將感情投注於數段愛情關係，卻未有善果。在家庭與情感陷入絕境時，女主角感悟「她的一生都在尋求一所安全而高貴的去處，不斷的追尋與思考」（〈走出奇幻〉，頁 39），企求安全感的心理實是生命創傷所致。詭譎可厭的戰爭讓她和她的家族處在歷史漩渦的時代矛盾，於是毅然進入修道院為大眾奉獻，以療癒人類傷痛為己救贖。〈走出奇幻〉和〈仙人掌物語〉的敘事聚焦於女性，這些女性被困於時局的男性所拋擲棄置，歷經考驗後獨存於世；然戰爭也帶來解放機會，重新定義角色分工與陽性、陰性特質歸屬。如修女瑪琍安化怨恨為大愛而獻身公益，趙子菁則獨力扶養姪女，擔起大哥作為父親的責任。

〈烽火歸人〉是唯一以作家真實經歷為敘事基底者，以想像力結合親友口述，拼湊出時代片段。此篇以 1930 年黃美之逃避紅軍的家族經歷為本，場景設定於故鄉長沙。敘事者為喬裝貧戶躲避紅軍的小學生人美，以兒童視角觀察國民革命軍與共產紅軍對峙下的戰時家鄉。流離棲居長沙城內的人美與家僕一行人，吃食

14 黃美之，〈劃清界線〉，《歡喜》（台北：躍昇文化，2000.04），頁 157。

15 柯惠鈴，〈大難來時各自飛——抗戰大後方的婚姻變奏曲〉，《民國女力：近代女權歷史的挖掘、重構與新詮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09），頁 210。

無虞，但心裡始終承受不安和恐懼。尤其夜裡的奔逃將主角逼嚇出莫名急病，其病因明顯來自戰時社會的生存壓力。故事尾聲於歸家路途的敘事者眼見路旁躺臥的一排紅軍屍體而驚叫，再見家園幾處火後飄盪的黑煙，背脊不禁感到迫人的寒意。屍體是死亡對生命的侵擾，呈現對秩序、界線或位置的擾亂。¹⁶眼前的死屍清楚昭示敘事者急欲逃避的戰爭暴力，並顯現己身生命處境的界限與日常秩序的崩解。因此，眼前失衡情景使她愈加懷抱回家的強烈想望，此際歸家之路正意味邁向生活常軌的意蘊。

至於描述家族流變的小說文本，〈月白刀傳奇〉以成家四代傳世的尋刀心結為主軸，時序串接了陝甘回亂、辛亥革命、中日抗戰與戰後復員、中國文革等歷史動亂。此篇以「刀」為取材來自黃美之於孫立人書房中所見物品，和對中國兵災連年的感觸，情節則為虛構。故事起源為成家先祖成定生於塞外戰場拾獲利刃，雖用之奮勇殺敵獲得晉升，身體卻一病不起的異談。回鄉休養的成定生對刀產生莫名癡迷，為他收魂的道士將殺氣深重的刀刃深埋道觀以掩其鋒芒。第四代的成維親赴道觀尋刀，途中遇到一名清秀卻疑有精神疾病的女子，話語和思緒都停留文革破四舊的紅衛兵運動時期。成維於詭異女子的威嚇下，倉皇離開時不禁感慨成家的衰落，從奮勇殺敵的曾祖父到關入牛棚再教育的父親，如今自己淪為以刀圖謀個人利益的地步。叢甦認為〈月白刀傳奇〉是牽涉因果論的武俠或浪漫短篇，主角將血腥利刃轉賣為文物實是明智選擇，¹⁷如成維所言「我們成家受不起，因它背負著太多的血淚冤緣和辛酸歷史」（〈月白刀傳奇〉，頁124）。此刀除了承載著殺戮，亦為時代歷史的具現物。從殺氣凌人的武器變為刀鋒鈍澀的殘缺彎刀，月白刀歷經的歷史及其變貌映照生存環境的時代變革，和成家世代漸次蕭條的家族流變。

〈追殺 落日〉分為〈前世〉、〈今生〉上下兩篇，同以「歷史並不能重演，只是從未跳出人性的框架」為序言。上篇由太平天國之亂平息後數年寫起，主角歐陽資盛為曾國藩軍事訓練的湘勇，退役後從商；下篇主角為成長於台灣戒嚴時

16 克莉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著，彭仁郁譯，〈第一章 卑賤之取徑〉，《恐怖的力量》(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3.05)，頁 5-6。

17 叢甦，〈無常亂世中的悲喜滄桑——略評[烽火儷人]〉(來源：<https://pse.is/8udk84>)。

期的外省孩子胡慶文，於軍部工作的父親遭政府以匪諜罪名逮捕，徒留寡母孤子，胡慶文成人後嚮往自由而旅美工作。〈追殺 落日〉分別以清末內戰與戒嚴準戰備環境為情境起點，並以此間及其後的人物境遇和人性刻劃為主軸。〈前世〉歐陽一家被貪官刁難陷害，父親歐陽資盛入獄，兒子遭押後形銷骨立、意識不清，母親避走老家，女兒為追兵所殺；〈今生〉裡被捕的父親最終慘死、屍首不全。而負責審理胡父案的王保仁則橫死異鄉。〈追殺 落日〉兩篇時空相隔甚遠，但世局皆為政治動盪、民不聊生的亂世，描繪平民大眾只能在權力者的貪念慾望中煎熬度日；〈如夢 如夢〉是描述越戰時赴吉隆坡度假的美軍貝爾的奇遇故事，貝爾進入無戰火的城市覺得如臨夢境，顯現對日常生活步調的不適應。他的病態是長期處於戰鬥環境下過於清醒的緊繃心理：「戰場上，生命是飄忽不定的，他有一點點悲從中來，但他已經被訓練得可以很快的恢復自己應有的情緒，譬如木然、鎮定、機警等。」（〈如夢 如夢〉，頁 94）因此，他的休假充滿幻夢感，飛機落地時的第一反應是驚恐詢問同伴是否有敵人，並下意識地想抓住武器。休假期間貝爾的思緒不時環繞著戰場記憶，身體反應也仍維持戰時的戒備狀態。

黃美之小說人物的共相之一為身分轉換：〈仙人掌物語〉趙子菁離家赴上海讀書而成為特務。〈糖水與同情〉情報員變身老兵來台、〈走出奇幻〉高官千金瑪琍安以修女身分奉獻社會、〈烽火歸人〉官吏子弟人美偽裝貧民逃難、〈月白刀傳奇〉知識人成青雲變成被批鬥的臭老九、〈追殺 落日〉胡慶文由匪諜遺孤蛻變為追求民主的新聞工作者。人物身分轉換都具對比性，存有時局劇變或政治迫害的因素，從而承載國族流離、政治迫害或性別壓迫的歷史創傷。女性角色更不乏挑戰或顛覆傳統性別規範的情節敘述，如趙子菁、瑪琍安、慶文母親等人在熱戰中取代家國歷史的男性角色，展露積極意志；其二，人物多具殘缺病弱的受創樣貌，如生理患病的〈仙人掌物語〉趙大奶奶、〈糖水與同情〉玉蘭、〈烽火歸人〉人美，及心理失調的〈走出奇幻〉瑪琍安母親、〈月白刀傳奇〉道觀女子、〈追殺 落日〉歐陽端官、〈如夢 如夢〉美軍貝爾等。這些人物呈現在遭遇或對抗重大壓力後的創傷疾患，壓力源指向戰亂時勢所致的社會或文化影響；其三，女性角色具有強烈的主體邊緣性，如叢甦指出〈糖水與同情〉表現個人遭逢離亂年代的主體賤斥。人物的瘋狂與病態，實是人性被壓抑的恐懼對象之出現，而這

時刻也是主體現身的時刻或是主體結構化的表徵。¹⁸如〈糖水與同情〉飽受折磨的玉蘭像苟活的幽魂，或是〈月白刀傳奇〉道觀女子意識滯留於文革時期的瘋癲言語。人物被歷史操弄的創傷透過各式症狀發聲，致其病狂者即近代中國動盪的戰爭遺緒，以及欲對抗時局的主體意志。

三、戰爭離散史的非典型親密關係

《沉沙》、《烽火儷人》所收篇章可見部分重複，包括〈仙人掌物語〉（〈心中的仙人掌〉）、〈糖水與同情〉、〈烽火歸人〉（〈回家〉）、〈月白刀傳奇〉四篇。記憶是種將過去經歷予以保存或遺忘的能力，關乎主體對過去事件的認知。若考量二作重複篇章與新作中篇小說〈流轉〉、〈烽火儷人〉所牽涉的國共抗戰、內戰和冷戰政治之背景，可見作家有意以近代中國戰爭的歷史框架，詮釋包括己身在內的戰爭歷史世代之流散境遇與生活世界。本節分由短篇小說與中篇〈流轉〉之敘事構圖展開討論，解析戰時情境下的離散情懷與情感關係：

（一）家的破滅與社會棄子

親密關係（intimacy）的認定經常帶有主觀判斷，法律上對親密關係的認定為雙方以情感或性行為為基礎，發展親密之社會互動關係，是具意義的私人生活重心。在梳理非傳統家庭觀點下的各類親密關係形式時，除了性伴侶之外，女性主義社會學家也將親子、手足以及友誼關係納入討論；而這些關係會受到不可控因素的衝擊而產生變化，如身心疾病、意外事故、貧窮死亡、戰爭時局或其他社會因素；¹⁹此外，親密關係的議題也經常在婚姻家庭體制中，結合經濟、階級、性別等「公領域」脈絡中一同提出，牽涉力量關係的部署與實施。²⁰黃美之小說書寫正顯現前述不可控因素之於親密關係的衝撞或部署，而展現出「家庭價值」

18 劉紀蕙，〈導讀：文化主體的「賤斥」〉，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著，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頁xxi-xxv。

19 林恩·傑米森（Lynn Jamieson）著，蔡明璋譯，〈導論〉，《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頁2-3。

20 婚姻家庭制度作為一種社會中存在的「強權」，顯現親密關係可作為一種思辨婚姻家庭私有制的公共性議題，啟發筆者對黃美之小說人物於離散情境中主體情感流動與親密關係調節的討論。劉人鵬，〈晚清毀家廢婚論與親密關係政治〉，《清華中文學報》5期（2011.06），頁254-259。

主流理想化形式之外的非典型親密關係，尤其是家庭內男性與妻兒的情感連結和相應責任的相關描寫，凸顯了近代中國戰爭情境下國家暴力與社會體制對情感關係的解構與重組。²¹

《沉沙》所收錄的七則短篇都存有家的構圖與社會邊緣的人物，這些「家」與「人」皆因戰時情境而破碎或重構，損壞家作為安全與休憩的場域意義。按故事時序，七則短篇中〈月白刀傳奇〉、〈追殺 落日〉二篇時空背景皆起自清末，時間跨度廣。〈月白刀傳奇〉敘述成家四代與戰爭亂世相縛的變遷：曾祖父成定生征戰塞外卻因一把利刃而疾病纏身，第二代成新平離家求取權位卻苦於無子，第三代成青雲遠赴重慶投身抗戰，與父死別，戰後留在中國的他迎來翻天覆地的失落；第四代成維則熬過破四舊的文革動盪，經歷父親被關入牛棚、姊妹成為紅衛兵的不安成長期。成家四代的人生和家庭都不完滿，尤其父親成青雲歷經中日抗戰、國共內戰與文革的多重波折，家庭關係破碎，且消磨掉少時懷抱的愛國熱忱，成為社會秩序排斥的他者；〈追殺 落日〉上篇裡歐陽資盛服役隨侍的外籍將軍和財富累積，成為他得罪縣令的原因；下篇胡遠智因妻子美貌而被人陷害入獄，日後橫死。上下篇的「家」都有個被體制排除而缺席的父親，關係則毀於政府官吏當權者的人性慾望，一則具因果業報的警世意涵，二則顯現男性其實也是國家霸權式陽性特質的被宰制者，改由女性登場小說主線。

〈烽火歸人〉以作家幼時的生命史事件為基底，時空落在 1930 年共產黨工農紅軍與國民革命軍在湖南的軍事對壘。小說中的家庭雖未家破人亡，但在國民政府工作的父母獨留子女避走他地，故在敘事者的兒少視角中宛如被遺棄的處境。親子關係向被認為是私人親密關係中最強韌者，但社會學家也指出物質條件和關係品質往往深刻影響家庭關係的運作。²²〈烽火歸人〉呈現出戰爭流離對家庭感情的破壞與召喚，新版篇名改為〈回家〉且新增序言「瀟灑的烽火 偏引領

21 戰時家庭解體的現象包括親族離散、財產破損、經濟困難、子女失學流浪等，其中涉及兩性關係最明顯的是婚姻問題。戰時家庭陷入破碎，離婚、重婚或另組家庭的情況眾多。呂芳上，〈另一種「偽組織」：抗戰時期婚姻與家庭問題初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 期，頁 99-105；游鑑明，〈處處無家處處家：中國知識女性的烽火歲月〉，《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3 期，頁 52-53。

22 林恩·傑米森（Lynn Jamieson）著，蔡明璋譯，〈親職與親密關係〉，《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頁 75。

著回家的渴望」。²³就〈烽火歸人〉的兒少敘事者人美而言，她從未離開地理空間意義上的家，卻與手足、僕人流動於宗祠、鄰里巷弄、茅棚等家外處所，偽裝貧戶家庭以躲避紅軍的劫掠。這種戰時的偽裝、避難生活，包含令人畏懼的紅軍，一切人事物對敘事者而言猶如幻境般的舞台劇：

兩個紅軍很嚴肅的站在丹墀中演說，拿著那極原始的武器，而太陽正在當中，就像舞台正中的大煤氣燈，使得他們很舞台化。在我幼稚的心靈裏，他們的存在並不真實，他們的恐怖性也變得十分淡遠，而最後他們終於說了要大家回去過正常的生活，紅軍將保衛長沙。（〈烽火歸人〉，頁74）

突來的紅軍盤查與檢舉反動的宣導演說，並未令小學生的敘事者產生心情的極端波動，反而是避居茅棚被主人家妻子大罵時感到無比委屈。國共軍事對峙的時勢顛覆原有的社會位階與空間秩序，家境優渥的主角必須偽裝貧民，避難過程宛如與僕人組成臨時的家庭四處流動，還得委身貧民區茅棚。一行人雖暫保人身安全，身心卻始終不得安寧。作家巧妙運用茅棚內外空間通夜的蟋蟀聲、蛙鳴、蚊子嗡嗡與槍聲諸種聲響交錯，刻劃身心受迫的感官抑鬱。

〈走出奇幻〉、〈仙人掌物語〉、〈糖水與同情〉同為抗戰前後關於情報員、漢奸的時代故事，確立「家的破滅」與「社會棄子」之敘事主題。以周佛海一家為藍圖的〈走出奇幻〉，主角相信父親宣稱的東亞和平與護衛同胞的理想，摒除政治見解，與父母一同在南京奢華過日；然而中日戰爭的結束打破這種表面的美好，父親被定罪為漢奸下獄：「她心中父親的偶像已被砸得粉碎，但面對這歷史軌跡，她是無有怨尤的。」（〈走出奇幻〉，頁25）身為獨生女備受父母寵愛，基於摯親敬愛而相信父親的政治信念，但歷史洪流卻無情淹沒父親於政治批判中。主角對此雖無怨恨，但探監時兀立一旁的她只覺暈眩的窒息感，母親則絮絮叨叨的嘖咕瑣事。前述反應呈現母女倆無所適從的身心狀態，加諸瑪琍安求學時

23 黃美之，〈回家〉，《烽火歸人》，頁317。凡正文所援引之《烽火歸人》諸篇小說引文，皆於文末直接標示篇名與頁碼，不另作註。

因漢奸父親之故而受人冷落，莫不彰顯〈走出奇幻〉描繪政治犯家屬面對血親情誼與國族政治的尷尬處境，以及置身社會邊界的流放心理與生命創傷；〈仙人掌物語〉裡害怕受趙子英罪嫌牽連的趙氏家族，對趙子英一家持切割態度，背離親戚互惠規範的文化期望。唯一的國外雇主聯絡信，因抗戰的緊張局勢被趙家人倉促燒毀，致四處找尋父親墓地的趙秀萍始終未能如願，所有父親的信息「在戰火中絕滅了，是無法再尋覓到的了，不管是好的或者是壞的。」（〈仙人掌物語〉，頁9）戰爭時局滅絕的不單是趙子英身後訊息，也包含趙家手足間的情感連結與關係羈絆。〈仙人掌物語〉以趙子英一房的悲劇烘托趙氏大家族親情倫理關係的淡薄，以及趙子菁慈母嚴父般養育姪女的非典型家庭關係，投影出民國戰亂的離散悲劇。

〈糖水與同情〉內存在著兩個「家」，也有著兩個被棄之人。主角的中國元妻玉蘭接連遭受各時期當權者的監視與拷問，丈夫工作多年的組織也瞞著玉蘭的狀況，由此表現玉蘭為社稷秩序與政治權力所排除的他者。在家族關係上，玉蘭亦不為夫家家族所接受，歷經磨難的她與孩子回到夫家故鄉，卻被眾人視為瘋子，生活起居得不到良善照顧，辛苦兼職得來的雞蛋也被親戚哄騙拿走。主角得知妻子狀況後，感嘆「大家庭又有什麼好呢？也不想想人家在外為國奔波，不看佛面也要看僧面的多多加以照顧才是，卻反而欺侮她。」（〈糖水與同情〉，頁57-58）玉蘭在老家孤獨無援的哀傷，縱使被丈夫接至山西後過得閒適，但與丈夫缺乏關懷的相處猶令玉蘭孤寂無援。此外，主角「他」於戰後復員時因政治鬥爭入獄十年，來台後雖得組織和朋友的幫助建立新家庭，但內心始終牽掛原配妻兒、已逝七弟。主角拋妻棄子來台求得人身安全的同時，亦被奉獻一生的國族所背棄：「過去自己的熱情與憧憬，激昂與執著，那樣費盡了心機，到後來也只落得很不光榮的死裡逃生。這一切，很難以忘懷，只是歷史的洪流，也都如這江水般流走了，空留一份悵惘如永恆的傷口，在他心靈的深處。」（〈糖水與同情〉，頁63）縱有台灣溫情的家，卻仍彌補不了昔日戰時中國的歷史創傷。戰後台灣老兵返中探親的衝擊，牽動主角一連串的歷史記憶與生命悔悟。對主角而言，破碎的不只是家，還有他自己的心靈。

家是主體性構成與實踐的關鍵，同時被建構為愛、情感和同情的所在，女性

則肩負養育照顧之責。²⁴ 黃美之小說情節雖常描繪家庭原型或女性角色的崩解，然而其中仍可見親密關係的另類重組與再生。如〈仙人掌物語〉的姑姪家庭、〈走出奇幻〉的修道院團體、〈烽火歸人〉相互照撫的同鄉鄰里、〈糖水與同情〉戰後來台重婚的老兵、〈追殺 落日〉身兼父職的寡婦文韻梅等；關係重組的人物含納了被社會群體拋卻的各式棄子，如父母雙亡的趙秀萍、政治犯子女的瑪琍安和胡慶文、被雙親留在故鄉的人美、落入政治鬥爭的情報員和政府官吏家屬。此外，〈如夢 如夢〉美軍貝爾休假中憶起擔任偵察敵情的哨兵經驗，在未知位置的敵人目光下，猶如被隊伍遺棄般於死寂的叢林沼澤中摸索。然來到無敵無友的度假地吉隆坡，他依舊是個落寞失根的異鄉人，形成另類的被棄之人。家庭是成人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情感慰藉，對家庭的情感寄託是個人健康與社會健全的前提。²⁵ 由此可知，黃美之描繪了國家暴力與社會壓力之戰爭遺緒，尤其是對家庭親密關係的解構與非典型重組，亦是寫照戰時離散者的破碎主體與多重困境：「整個的時代正在翻天覆地，個人、家、國，都在破滅。」²⁶ 戰亂的成長經驗，讓黃美之體悟生命、身分或關係的朝不保夕，這是離散主體的獨特認知。於此，黃美之的小說展現了超越國族集體的解構性，回到每篇故事人物碎裂的生命現場，梳理人物於道德、心理與情感層面的矛盾，以訴諸情感上的認同與療癒。

（二）解／構關係：離散主體的情感和成長

中篇小說〈流轉〉描寫 1949 年前後大學生的聚散悲歡，此篇發表於 1967 年 9 至 11 月的《蕉風》月刊，分為三部。作家張鳳認為〈流轉〉是描寫亂世男女前路渺茫的情愛小說，從其故事背景的設定能見出黃美之個人戰時經歷的投影，包括廣州生活、大學生身分、日常活動型態等。作家自述廣州借讀時期是她最快樂的時光，罷課罷教浪潮下的空檔提供學子更多自我時間，遠離戰火；然而面對紛

24 琳達·麥道威爾(Linda McDo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第三章 家、地方與認同〉，《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05)，頁 103-104。

25 林恩·傑米森(Lynn Jamieson)著，蔡明璋譯，〈有好朋友就心滿意足？〉，《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頁 99-100。

26 黃美之，〈風雨姐弟情〉，《深情》，頁 212。

擾世局也不免感到前途茫然和思緒紊亂。²⁷ 社會關係總是依存於空間型態，朱天文評述〈流轉〉涼台上的日子寫出抗戰時生活與人的質感。²⁸ 黃美之以宿舍、涼台、校園等棲居空間取代前述短篇對家構圖的敘事營構，展開每日經驗與情感關係的人情探究。²⁹ 此敘事設定除了呈現女性戰爭記憶對情感細節的敘述特徵之外，親密化關係的用筆則體現出戰時的人性感受與日常變化。親密關係的建立本無普遍的方法或原則，然而戰時居住空間的限縮和物質生活的有限性、同病相憐的處境，於〈流轉〉中一同促使人際關係往親密化方向推展，構築親暱的情感互動樣態。

〈流轉〉以兩行文字啟動故事：「感情隨流轉的時光變換 命運從流轉的時光顯現」（〈流轉〉，頁 135），意即近代戰亂中國的時光流轉左右了個體感情與命運，同時回應故事由個人小我刻劃時代變遷。〈流轉〉的敘事者是轉學至廣州某國立大學的歷史系二年級學生劉曉梅，男主角為哲學系四年級的鄺鈞，情節架構於劉、鄺二人在抗戰結束乃至國共內戰間離散情境的情感關係與成長蛻變。故事展演了近代中國的社會生活及青年思想、文化經歷，於戰爭復員時期演繹出青年男女的生活空間和文化樣態，男女結合或情感關係達到空前「自由」的混亂現象。³⁰ 國共內戰的臨戰氛圍對女學生的影響在小說開篇昭然可見：

有人告訴我們，共產黨來了，會把所有大學的女生嫁給三輪車夫。我聽到時不禁皺起了眉頭。但想想，應該是謠言吧。而這謠言卻像瘟疫，真的起了作用，那些每天站在校門外的三輪車夫一向老實恭順，現在卻變得輕狂了，每有女同學經過，他們就圍攏過來擠眉弄眼、擦著你的身子問要不要搭車。這使我們對那一無所知的未來，感到像站在懸崖峭壁，面臨深淵一般。（〈流

27 黃美之，〈看海〉，《深情》，頁 105-106。

28 朱淑珍，〈讀罷半掩卷 清淚已三行《烽火儷人》迴響系列二〉，《旺報》，C15 版。

29 人類的棲居之地皆有家的庇護、安全、愉悅之觀念本質，整合了思想記憶和社會秩序的存在。同註 24，頁 98-99。

30 戰爭之前的在校陶冶與教導是近代中國女學生深刻的共同記憶，然而戰爭造成的社會失序讓家庭、學校或婚姻不再是女性的避風港，婚姻情愛論述被喚回傳統的生命共同體價值，社會網絡、親情制約甚至法律規範亦對婚姻、家庭的影響日漸式微，顯現戰爭極端狀況下的道德困境。柯惠鈴，〈戰爭、記憶與性別——女性口述訪問紀錄中的抗戰經驗〉，《民國女力：近代女權歷史的挖掘、重構與新詮釋》，頁 223-232。

轉〉，頁 136)

身分是由社會所界定，在不同歷史時刻會改變定義。劉曉梅透過沸騰的傳聞、車夫的言行感知身分位置的變化，國共內戰的緊張局勢與未知未來尤令女學生在烽火四起的時代無所適從；相反的，這種不安全感伴隨戰時精神與物質的限縮，卻也催化情感關係的建立。〈流轉〉裡以劉曉梅為核心可延伸出她與表姊梧桐、室友文玉珍的友情關係，以及與鄭鈞的愛情關係之兩大敘事線，且兩種情感關係於小說內相互作用。

作家對離散學生的描寫是由頂樓寢室和露天涼台的空間開展，標誌人際交往和社會位置。頂樓的同層學生多數是來自廣州之外的轉學生，閒暇時眾人便聚在涼台上聊天、唱歌、眺望物景。涼台含納的不單是曉梅與一眾女學生，還有女學生們的異性友人，使此處成為流散青年的天地。人們彼此信任或合作可能緣於惡劣的社會條件，同樣處於孤立或缺乏資源的環境中。³¹ 身分、時代環境與所處空間的相似讓大家形成友愛互助的氛圍，組構成離散學生的同質群體。若就與家人相隔兩地的劉曉梅而言，表姊兼室友的梧桐結合了親屬關係的必需性與友情關係的選擇性，又更具話語權和情感支持的力量。³² 因此，面對鄭鈞的邀請信函，猶豫不決的劉曉梅獲得梧桐的鼓勵後便欣然接受邀約。〈流轉〉的朋友關係並非人際外圍的社群，而是被作家建構為日常的志願性之揭露式親密關係，個人得以於此關係基礎上追尋自我；然鄭鈞與其他流離的大學生相比是異質存在，恰如他鮮少進入涼台同樂的姿態，劉曉梅與鄭鈞的第一次衝突便發生於涼台：「一則，他若真正喜歡我，即算是拚命，也得幹；二則，我自己雖不喜歡吃苦，但絕對瞧不起不能吃苦的人，尤其是男人。在戰亂中成長的孩子，對於吃苦的能耐有很高的標準。」（〈流轉〉，頁 160-161）此處藉情感觀念和成長經驗演繹了兩人的根本差異，小說也透過曉梅內心的分類彰顯彼此條件的殊異，暗示日後疏遠別離的結

31 林恩·傑米森 (Lynn Jamieson) 著，蔡明璋譯，〈有好朋友就心滿意足？〉，《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頁 96-97。

32 親戚與朋友可視為類似的私人關係，兩者都將個人與父母、伴侶、家人之外的其他人予以連結，具有相互的責任。而親戚關係又具社會規範下互惠的文化角色期待。同註 31，頁 90、100。

局。

〈流轉〉呈現戰時流散情境中青年情感結構的特殊形構，即離鄉背井的生命愁思、面對內戰的無能為力，以及關係確立的欲望之間的張力。此情感結構發酵於劉曉梅與鄭鈞之間的關係發展，若即若離的兩人存在著情感上誰更為在意或付出更多的競爭。從鄭鈞的位置而論，他包容著不諳人情世故的曉梅，向其示好卻又保持高姿態，維持著不對外公告戀愛關係的曖昧距離。面對年長、世故且出身權勢的鄭鈞，劉曉梅不甘任其擺佈，總不積極迎合或熱情回應，甚至想讓鄭鈞改變尊貴自處的作風，此態度抵拒了對女性賦予情感堡壘的規範教化。此外，兩人的相處雖稱愉快，曉梅卻自省大半源自感官物質層面的享受，滲入了消費社會的世俗價值。兩人的關係缺乏了青春單純本質的快樂，以及鄭鈞本人對曉梅的吸引力。阻礙兩人情感進展者尚有親密關係潛在的不確定性因素：愛情的模糊性與外來競爭者的影響。前者可見於曉梅對鄭鈞態度的猜疑，後者如介入的友人路蕙莎或中途出場的土木系男學生、醫學生樂怡等，新人物的登場總能突顯鄭鈞、曉梅於情感需求上的落差。前述情節呈示了兩人之間性別政治支配、經濟不平等的狀況，以及情感依附關係的不對等和不確定性。

安全感是內在培養與外在情感紐帶交織的產物，人際社群、文化倫理或者是社會層次都可能影響安全感的存在。³³ 劉曉梅處理感情的猶疑態度和困惑，亦起自戰爭時局下自我定位與前景未知所衍生的不安感所致：「這小船上的六個人，倒是我們三個女孩子最直接受這時代的播弄了。我突然感到自己像是淹在水中的人，無人可救我，只有自己奮鬥了。」（〈流轉〉，頁 198）、「什麼是可靠的？尤其是在這種亂世。我心中又有些淒涼迷惘之惑了。」（〈流轉〉，頁 205）學生們因出身背景相異，對當前中國動亂擁有不同感受，對比他人有家可歸、有親友可依附，敘事者曉梅孑然一身，主體的孤寂意識益加強烈。她的少不經事和倔強性格更令自我意識過剩，對他人視線的在意不斷影響她的行動和抉擇。如兩人在車上的吻頰，曉梅十分介意過程的倉促與司機視線。其後兩人在鄭家的擁吻，

33 伊芙·李凱爾特（Eve Rickert）、納瓦·斯莫拉什（Naava Smolash），〈推薦序〉，潔西卡·芬恩（Jessica Fern）著，柯昀青譯，《多重伴侶下的安全感：依附關係、創傷理論，與知情同意的開放式關係》（台北：麥田出版社，2023.04），頁 11-12。

未有戀愛經驗的曉梅一時陷入熱情，卻旋即反應「本能的知道這是危險悲慘的開始，就不顧一切的用力推開他，用最快的速度爬了起來，緊緊的貼著牆站著」（〈流轉〉，頁 176），面對鄺鈞熟練的求愛姿態，曉梅驚惶失措之餘產生憤怒，事後鄺鈞平和的神態又令她充滿矛盾與疑惑。此外，交往過程中曉梅希望與鄺鈞父母見面，卻反倒得知鄺鈞家庭關係的不和與疏離，而感到無所適從。可知曉梅除了關注兩人情感的互動發展，總是更加介懷外界人事的問題和他者觀感，由此表現離散女性對情感依賴的脆弱與敏感。

愛情關係的親密與界線是相當重要的概念。界線是主體在身體、精神與情感上建立主權的方式，也是與他者建構和處理關係的交會點。因此，自主性與連結感不是相對立的存在，而是能同時兼備的體驗。³⁴〈流轉〉以曉梅的表姊梧桐、友人路蕙莎，表現女性在親密關係中對情感自主性與連結感的追求：

她倆都有很多男朋友。梧桐可以同時應付幾個，對誰都不動真情，誰也不得罪。路蕙莎每次只有一個，而且很認真的墜入情網，但她不是一個肯將就一點的人，……在那些不能瞭解女孩子心理的人看來，路蕙莎和梧桐都是玩弄男性的浪漫女子，人言雖是可畏，但她們無法擺脫男士們的追求，也無法改變她們自己的個性，所以她們倆常開玩笑說：「我們進修道院去吧！」（〈流轉〉，頁 187-188）

國家體系失衡、人口劇烈流動、經濟惡化等戰爭情境，將人際關係轉變為簡易、速成，日常倫理則陷入崩解與秩序的重建。³⁵在曉梅的視角下，梧桐、路蕙莎是知道自己所求、堅持自我價值的女性，不受時局與世俗眼光所限，展現出理想親密關係中「親密」與「獨立」的價值並存。這群女學生自戰爭動亂中逃逸而選擇棲居他方，實是一種安居於流放之中的生存哲學展演，並得以構築其離散遷徙中

34 根據主體接受他人或向外給予時的寬嚴標準，界線又可分為二類：緊密相連且不受保護的「滲透界線」，與受到保護卻無連結的「嚴格界線」。潔西卡·芬恩（Jessica Fern）著，柯昀青譯，〈依附的不同向度〉，《多重伴侶下的安全感：依附關係、創傷理論，與知情同意的開放式關係》，頁 84-89。

35 柯惠鈴，〈大難來時各自飛——抗戰大後方的婚姻變奏曲〉，《民國女力：近代女權歷史的挖掘、重構與新詮釋》，頁 199-204。

的親密關係，一如瀟灑的梧桐和路蕙莎無論處身何處都能掌握婚戀情感的主動權。³⁶ 可以說親密關係成為離散女學生主體建構的展演場域，挑戰了戰時家國敘事的倫理規範。劉曉梅同樣作為離鄉寄讀的離散者，〈流轉〉記敘她於戰時日常逐漸習得安居生存的歷程，因此情節不乏酸楚的情感體驗與懷鄉情思，呈現外在社會經驗與內在離散情感的調節。

〈流轉〉透過梧桐、路蕙莎、劉曉梅等離散女學生，刻劃對性別角色期待與標準生命經歷的破格。宿舍群居的女學生接連疏散、畢業，以及敘事者曉梅與鄺鈞的情感歷程，皆另呈現戰時渺茫局勢中親密關係的解構。鄺鈞別戀路蕙莎與上海失守的內外打擊，促使曉梅短時間內感悟成長：「當我對他說『很多是情勢無法解釋時』，我就覺得我已成長了，因為我有了一種超然物外的感覺，我的心靈感覺到一種解放。」（〈流轉〉，頁225）敘事者的情感歷程回應〈流轉〉開篇所述，感情隨流轉時光變化的啟示，時局催逼了個人身世的飄零與成長調適。〈流轉〉以上海失守的淞滬戰役為界，敘事線從曉梅的愛情轉折擴及青年學生生涯、社會生活的劇變。此由曉梅赴台前接獲上海親人的來信，引發永別酸楚的情緒襯顯得出，一貫灑脫的梧桐讀信後也不禁感觸戰患對人類的影響；而1949年之際的社會景況，自教育部辦事處的倉促搬遷、土匪搶掠、赴台船客的擁擠盛況等，呈現生活秩序與國家法治的多重脫序。抵台後眾人生活型態的轉變再度牽擾校園時期建立的情感連結，曉梅因感於與梧桐等人疏遠而決意赴美。〈流轉〉以時間對生命軌跡的改變作結：與路蕙莎婚變的鄺鈞遠赴非洲務農、路蕙莎改嫁旅美、梧桐放棄留學在台結婚、曉梅隨夫定居吉隆坡。戰時離散的眾人看似再度流散各地，但實則都找到自己真正的定位，顯現〈流轉〉別具民國青年離散成長史的意涵。

黃美之認為文學承擔了歷史的使命，描寫生活形態、社會動向和人的所思所想。³⁷ 戰時民國生活和戰後遊歷亞非、定居美國的生命體驗，提供了作家小說的

36 馮品佳引述俄裔藝術史學者柏音（Svetlana Boym）的親密離散理論以討論眷村書寫，其理論雖是基於歐美國城市現代性與當代族裔離散的特殊情感結構論述，但其放逐情境中的離散親密關係與生存美學，可作為本文思考民國女學生離散主體的角度。馮品佳，〈離散的親密關係——蘇偉貞眷村小說中的感官書寫〉，《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5期（2012.10），頁193-194。

37 黃美之，〈我的文史緣〉，《歡喜》，頁238。

敘事時空與創作視域，回應了離散實為一種基於距離而具生產性的空間。³⁸ 劉曉梅自南京流動至廣州、台灣、美國、吉隆坡等地，此空間移轉恰對映作家己身的移動，以及體現民國離散青年生命流變的敘事生產。基於前述文學觀及對近代中國歷史與大眾生活的認知，戰時離散境遇與人性審視為黃美之短篇小說的敘事核心，小說人物組構戰時離散社會中非典型的「家」關係形式。人物與親友、原居地或既有生命規劃等的分離、斷裂，讓戰時社會關係轉變為簡易、速成且脆弱，日常生活則陷入倫理崩解與秩序重建。這一群無以為家的離散之人，解構社會對關係形態的典範預設，而選擇自己理想的生活樣貌，顯影了親密關係的解構與非典型關係重組。「國家」在戰爭語境的規範性期望中不再是個體自由或群體權利的應許之地，自我與他人的生活持續交織並受戰爭遺緒所左右，呈示離散情境下個體依存關係的動態演化，以及國族權力邏輯與個體生命運作的相互作用。

四、以愛情刻劃政治：〈烽火儷人〉的自我揭露與情感依附

黃美之的創作表現是由歷史時局漸入小我生命，題材先述中日戰爭與國共內戰期間青年大眾的日常生活與情感關係，再寫 1950 至 1960 年個人的白恐受難經歷，最末回顧 1949 年 5 月來台至 1950 年 3 月入獄前的此間生活，顯現來台後至入獄前記憶的獨特性。〈烽火儷人〉不僅觸及此段經歷且跳敘至旅美的 1990 年代，具有人物設定的真實對照、污名修復和作家自我揭露之爭議，故本文擇以單獨論之。

（一）為何而寫？——去污名的書寫修復

〈烽火儷人〉的文本生產脈絡複雜，不能化約為單一屬性體裁。因為黃美之擔任孫立人秘書的戰後經歷，及其受累獲罪入獄的受難過程，牽涉了傳統價值對婚外關係、個人人格的倫理譴責，與戰後台灣國族族類污名的政治問題。在內外重重壓力下，即便移居島嶼之外的作家仍刻意對此段工作經歷與情感關係少有陳

38 李有成，〈離散經驗——李有成與張錦忠對談〉，《離散》（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13.08），頁 157-160。

述，僅以散文抒寫個人入獄經歷；然至 2010 年卻一改故轍出版描寫孫立人的篇章，實是發乎護主心切、力抗謠言的平反心態：

對於一九四九年五月我來台灣至一九五〇年三月我坐牢之前的那一段時光，不管寫小說寫散文，我都適可而止的少有提及，似乎是一種很好的修持。直到二〇〇七年，我在北京和一位相識多年的朋友聊天，他雖在共產主義的制度中成長，但很敬佩國民黨的一位英勇作戰，為國海外爭光的常勝將軍。但這次這朋友卻很駭意的告訴我，說那位將軍曾活埋了兩三百日本俘虜。因戰爭本是殘酷的，我很平靜的聽著，但回頭想想，這絕非那將軍所為，這是謠言，一定是他的政敵在抹黑他，或者是那些真正恨死日本人的人，覺得說是這名將做的事更能出氣。對於這位將軍的豐功偉蹟，為他寫的書已很多。但對他的感情和他在一種很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所忍受的苦惱，我，應可說是有所瞭解。我覺得我不應逃避用筆來寫出我所知道的他的另一面。³⁹

黃美之突破長年情感與政治的禁錮，試圖以文筆導正歷史記述。引文說明為何在 60 年後書寫孫立人，以及作家自己戰後來台的數年經歷，除了恢復孫立人的正面形象和聲譽，還有補述自己於複雜冷戰政治的真實處境，以修復社會規範中所謂「名將」的正常狀態。⁴⁰ 因此，〈烽火儷人〉的體裁設定據作家所述並非純然小說或傳記，乃是讀完《西京雜記》後觸發使用「札記」，寄寓了記錄歷史人物真實肌理的用意。然而《烽火儷人》的出版依舊掀起波瀾，作家特藉《烽火儷人》自序〈我的心香〉以述心志。文友趙淑敏不畏眾議為黃美之辯駁，強調此作是忠

39 黃美之，〈我的心香〉，《烽火儷人》，頁 6。

40 爾文·高夫曼 (Erving Goffman) 著，曾凡慈譯，〈第一章 污名與社會身分〉、〈第四章 自我與他者〉，《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台北：群學出版社，2010.07)，頁 5、150-151。高夫曼指出污名大致分為三種類型：身體方面、個人性格與族類宗教的污名。他認為當社會共享的規範性期待被打破時，就會引發受污名者執行修復的措施，直至規範性困境停止並且修復損害。

於情感的女性書寫。⁴¹發行人華文衡從孫立人子弟兵的角度說明出版與否的思索煎熬，評述此作呈現政治受難者苦痛歲月的美好往事和心靈撫慰。⁴²

於小說創作前，1990年底寫成的散文〈將軍的委屈〉描述孫立人對升任陸軍總司令後的反應，呈現戰後台灣政治時局美國勢力與國民政府的關係拉鋸，以及愛國忠誠且具新思維的孫立人形象。⁴³〈烽火儼人〉以非杜撰的「札記」小說體裁力求真實呈現孫將軍的另面形象，叢甦亦評述此篇是還原歷史人物的人性原色。⁴⁴小說敘寫孫立人軍務之外日常生活的行事作風，追憶其精銳領軍、憂懷國事、真摯情感等多面形象，立下歷史見證。此力求真實的用筆，一是回應前述名譽修復的寫作意識，一是呈現黃美之面對前述倫理與族類污名問題時，對個人身分和社會身分的自我覺察與接納過程。2010年6月《烽火儼人》正式付梓出版前，2010年5月20至26日小說已節錄連載於《旺報》「兩岸史話」版，其後更刊載系列迴響文章與黃美之在美國接受《中國時報》報系的專訪。〈烽火儼人〉內容一如作家真實經歷，戰後黃美之本是來台準備繼續求學，此間拜訪寄讀中山大學的朋友章超，故在將軍行館作客而見到孫夫人張晶英。後於孫夫人聘僱下黃美之赴屏東充任孫將軍秘書，放棄求學。⁴⁵黃美之與孫立人因工作而有了相處機會，雖然不及一年，這段經歷卻造成作家生命的重大轉折，生命不同階段所經歷的時間跨度是不可比較的。作家以小說訴說真相能否療癒其身不得而知，但發話權還於當事人確實是邁向療癒的要件，前述報刊連載與讀者迴響也達到一定程度的對話。

記憶與身分建構密切相關，人們回顧過去的原因之一是欲獲得自我的身分意識，將過去解放以增強主體與自我的對話。書寫是一種記憶延續的過程，記憶必

41 趙淑敏，〈漣漪·大動盪中的不倫纏綿 筆友給黃美之的信——《烽火儼人》迴響系列〉，《旺報》，C11版；趙淑敏，〈漣漪·大動盪中的不倫纏綿 筆友給黃美之的信——《烽火儼人》迴響系列〉，《旺報》，C15版；陳徵毅，〈旅居紐約名震兩岸的女作家——趙淑敏〉，《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50期（2011.06），頁24-29。

42 華文衡，〈出版後記〉，黃美之，《烽火儼人》，頁362-363。

43 黃美之，〈將軍的委屈〉，《傷痕》（台北：躍昇文化，1994.07），頁103-107。

44 叢甦，〈無常亂世中的悲喜滄桑——略評[烽火儼人]〉（來源：<https://pse.is/8udk84>）。

45 黃美之任孫立人將軍秘書機緣，參見張鳳，〈思念烽火儼人 黃美之〉（來源：https://chinesewritersna.com/review/?page_id=20250，檢索日期：2024.04.24）；沈克勤，〈第十三章 鳳山訓練新軍〉，《孫立人傳》（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06），頁493-494。

然牽涉選取、持有、排除和壓抑的機制，故個體記憶不再專屬一人，可以是群體共有的記憶。⁴⁶ 從作家自序已知〈烽火儷人〉以孫立人為書寫對象，故事中概稱「他」，敘事者兼主角蕭湘則是黃美之的化身，同具歷史系、戰後來台、政治受難、異國婚姻等經歷。承此，自傳色彩強烈的〈烽火儷人〉除了重建、修復、補述孫立人形象，亦具作家對生命軌跡和歷史記憶之自我建構意圖。1949年成立的女青年工作大隊正是黃美之與孫立人、台灣冷戰政治交會的節點，故事藉蕭湘的視角與工作過程展現將軍一心為國的忠貞節操，亦敘述國家對女性的戰爭動員：

他創辦這美式婦女輔助隊時，曾經受過很多批評與阻擾，但他堅持組一隊受過嚴格軍事訓練的婦女軍，在戰時很能發揮輔助作用。……沒有經費，他便從男生訓練營中擠出一點經費培養女生大隊，所以她們的生活是很艱苦的。而他又很忙碌，並無多的時間去察看她們、關心她們，所以他唯一可做的，便是在她們的學科和術科方面，請最好的教師和教官來教導她們……。儘管這樣他仍常為經費不足而傷神，但總希望這群跟他漂洋過海來的女青年都能成為國家的人才。（〈烽火儷人〉，頁103-104）

女青年訓練大隊是孫立人仿照二戰美國後勤作戰的陸軍女性兵團，派員於中國各地招收女性知識青年，按軍中編制於屏東培訓女性幹部的組織。然因臨時成立而非國防部編制內的單位，經費運作上多所欠缺。⁴⁷ 除引文所示孫立人的為國動員和用心栽培，身為大隊一員的蕭湘也描述成員們彼此扶助，宛如大家庭般的團結氛圍。同時藉由1949年底蔣夫人視察女青年大隊、1950年蕭湘姊妹遭羅織入罪等事件，闡明作家短暫投身軍旅生涯中至誠愛國的心志與冤屈。此處情節結合戰後台灣白恐時代的政治氛圍與史事，側寫孫立人及其部屬所承受的軍政勢力打壓，從個人記述重新修復歷史記憶的真實，並插敘一段在台離散者群體的生活紀實。

46 黃涵瑜，〈「歷史可以被原諒，但不能遺忘」，或生命的歸零？——有關檔案、見證與記憶政治的一些哲學思考〉，《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6卷2期（2013.06），頁58-59。

47 沈克勤，〈第十三章 鳳山訓練新軍〉，《孫立人傳》，頁487-493。

整體而言，黃美之定位〈烽火儷人〉是段小樓空間中的亂世情緣，文本開篇引述張錯詩句「一切均在暗處流動 如一首風裡的情歌」（〈烽火儷人〉，頁13），強化文學性和情感意義，舒緩歷史沉重感。首節〈傷兵〉異於其他小節基調的筆觸，時空拉回中日抗戰期間負傷於松滬戰役的不具名將領「他」，刻劃古城長沙飽經戰火摧殘後的時代殘象。叢甦指出〈傷兵〉埋下成功的伏筆，點出「他」與街頭偶遇女孩早已相繫的情緣，且此節亦與末二節〈如夢〉所寫1960年代兩人出獄和軟禁境遇互為呼應，呈顯相遇不相識的人物境遇與無常世態。⁴⁸〈烽火儷人〉開篇除了確立孫立人掛心國家戰事、悲天憫人的性情形象，也鋪陳〈烽火儷人〉的亂世背景，運用柔性抒情筆調刻劃情感關係中歷史名將的人性本質。

（二）情感依附的回饋：女性主體的自我覺察

過去的記憶可以藉由各種場域、空間、物件支撐，以重新獲得我們的個人史。⁴⁹〈烽火儷人〉的敘事線連貫了國共內戰乃至冷戰背景，由牽動主角蕭湘命運的1949年大逃亡說起：「一九四九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動盪的一年。小孩的命運被決定，中年人的理念混亂、無所適從，老年人在觀望，卻不抱希望，只有年輕人理直氣壯地四處亂跑。」（〈烽火儷人〉，頁16）亂世是人物生存的場域，此社會情境產生了各種生活規則的混亂失序。台灣被設定為亂世中年輕人流散的空間，初來乍到的主角不時懷有孤單、流浪的感傷。主角蕭湘的出身背景、性格形象與際遇概以黃美之為原型，其地域流動和非典型親密關係的真實經歷作為情節推進的要件。故事開篇鋪陳蕭湘告別中國的家人隻身來台的孤寂心境，此際將軍秘書的工作有如浮木般予人心理與經濟上的安定感：「反正學校尚無消息、時局也不樂觀，抗戰時年紀還小不能為國出力，現在應也可以做點事了，而且也必須找個工作才能自立，才有可能把爸媽接出來，也算是投筆從戎啦！」（〈烽火儷人〉，頁26）將軍「他」的初登場是在台北府邸，透過蕭湘的視線描繪穿著軍服的白髮青年臉孔且具親切和藹的態度。將軍認為蕭湘為陽光般的存在，為環

48 同註44。

49 段義孚(Yi-Fu Tuan)著，王志標譯，〈第十三章 時間與地方〉，《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02），頁154-156。

境增添生氣與喜悅。由此可見，兩人相識之初即顯現自在安適的互動樣態。

依附是一種強烈而持續的社會性情感連結，人類的生活經驗層次都與依附有關，能動性的自主需求和人際連結更是人類的基本渴望與生命驅動力。⁵⁰ 秘書工作對長期處於離散境遇的蕭湘而言，滿足了身心上的生存需求，並為其提供在台北生活的人際適應與社會支持條件，於是在不知地理距離的狀況下旋即從台北南下屏東工作。蕭湘的工作內容與居住環境簡易單純，她與將軍於屏東公館的朝夕相處下情感進展快速，但小說內更多的是蕭湘對這段感情困惑與不安的自我覺察：

她和他那種無忌的親切，她只能在那小樓裡接受。她慢慢把她自己的手抽了回來，還不自覺地掉頭四面張望了一下，而後又想到：「我到底應叫他什麼哩？」這是她這些日子以來的困惑。……從她那樣家庭出來的女孩子，對於真實生活中的倫理觀念，仍會嚴肅以對，這便增加了她的痛苦，無法自在沉浸在這有如幻夢而淒美的情意裡。

因為這樣不正常的境況，使她不知要如何稱呼他，……她發現他給了她英文名字，也只有他們倆人在一起時才輕輕地那樣呼喚她。她知道，這只是他倆之間一種親密的秘密。她很喜歡這種只有他和她共有的一種秘密。（底線為筆者所標。〈烽火儷人〉，頁 37）

引文內蕭湘以「不正常」形容兩人的情感狀況，也提及倫理觀念給她的痛苦。人稱是定義人際關係的標誌之一，話語角色往往取決於具體的互動或事件。蕭湘困擾於如何稱呼「他」，一則顯示對兩人關係定位的猶疑不定，二則流露了對外在社會關係規範的約束意識，即蕭湘是在社會紐帶的場域中反身思考。同時，「他」主動起了蕭湘的英文名字，此只存於兩人之間的名字另表徵此段關係的親暱性、歸屬感及不公開：「我心中將永藏著他給我的名字，因為這是我唯一能私自擁有的他。」（〈烽火儷人〉，頁 38）「名字」成為敘事者對此段非典型親密關係

50 潔西卡·芬恩（Jessica Fern）著，柯昀青譯，〈依附的不同向度〉，《多重伴侶下的安全感：依附關係、創傷理論，與知情同意的開放式關係》，頁 80-81。

種種思考與情緒流動的寄寓物，也體現女性主體對倫理規範的分裂與掙扎。

親密關係的依附可視為一種回饋系統，童年早期的依附歷史和經歷，影響成人後對關係藍圖的期待與自我看待。⁵¹ 小說亦呈現兩人間近似於親子慈愛情感的聯繫：「她知道，此刻在他心中，他是他的孩子，是他的愛」、「在這亂世中，她不禁覺得他是她的支柱、像父親一樣」（〈烽火儷人〉，頁 47、63）黃美之接受《中國時報》報系專訪，自述因為仰慕英雄與戀父情結而對孫立人產生感情。⁵² 作家自述再加上小說背景，可知蕭湘女性主體的情感需求，乃受戰時去國離鄉成長創傷的匱乏與孤寂所影響。若考量〈烽火儷人〉所述般正妻疑似默許的狀態、遠離眾人的屏東空間，以及秘書兼情人身分的公私領域疊合，此多重情境倒也允許蕭湘暫時逸離社會價值的評判，持續與將軍的婚外關係。同時，她可在此婚外親密關係中自由表達情感，反思關係的深層情緒與互動模式：「現在因受不了這種空虛，便慎思起來，或者說在對自己、也對他在做檢討，有一種憂傷的霧，從她心底升起，瀰漫在整個屋裡。」（〈烽火儷人〉，頁 63）如必須養在蛇木上的蝴蝶蘭成為蕭湘身不由己的境況自喻，自覺熱戀中的身體與內心是寒冷冰涼的，以及對關係定位是否為愛情的困惑、痛苦或罪惡感。依附情感的形、維持和終止，都會產生強烈的情緒，尤其伴侶回饋對親密關係建立頗具重要性。⁵³ 蕭湘各式情緒波動源於主體的依附需求是否獲伴侶回應，或受社會和自我之雙重否定下，所連帶引發在情感上的滿足和被剝奪感所致。

在公開敘事與日常生活實踐中，伴侶被認為是核心的私人親密關係。⁵⁴ 然蕭湘與「他」的親密關係存在著婚外三角關係與家國體制的混成畸態，伴侶「他」常因國政軍務突然離開的特殊狀況，缺乏安全感的她深知這段不正常關係終會結束，未全然耽溺其中，其尋求自主的主體意識反而不斷被激發：

51 潔西卡·芬恩 (Jessica Fern) 著，柯昀青譯，〈依附理論概論〉，《多重伴侶下的安全感：依附關係、創傷理論，與知情同意的開放式關係》，頁 39-40。

52 劉屏，〈隱藏一甲子 孫立人婚外情曝光〉，《中國時報》，2010.07.02，A12 版。

53 林以正、黃金蘭，〈親密感之日常社會互動基礎：一個縱貫式的研究〉，《中華心理學刊》48 卷 1 期，頁 45-46。

54 林恩·傑米森 (Lynn Jamieson) 著，蔡明璋譯，〈親密且平等的伴侶？〉，《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頁 162。

這確實不是她那種年齡和歷練能分析出所以然的，她只是很快樂，忘了自己的漂泊，並總把腿伸得直直的，腳尖像跳芭蕾舞那樣，因為她很怕自己在他的懷中，有如法海和尚法鉢中的白娘娘，變得很小很小而至消失。雖然她在他的懷中很有安全感，卻也不想因此不見了。（〈烽火儷人〉，頁47）

安全感的滿足和愛情的快樂或激情未能吞噬人物的主體性，蕭湘透過將腿伸直的身體操控表達對保有主體的自我意識。此亦可得證於蕭湘計劃嫁給美國人以離開感情樊籠，以及現實中黃美之在1960年代不畏俗世眼光和傳統框架嫁予外籍人士，滿足追求自由的需求選擇。⁵⁵ 親密關係往往牽涉伴侶之間主體實踐與自我認同的性別政治，引文所述的「不想因此不見了」直指曾困於情感與政治羈絆多年的黃美之所重視的「主體」。自我認同是反身性的，且個人擁有建構自我形象的自主權，故自我認同的形構能協助思考個人對社會身分的感覺和管理。⁵⁶ 引文更引用法海法鉢（而非許仙）與白娘子典故，對照並辯證了傳統道德框架、婚外親密關係及女性主體三者間的價值糾結。是故〈烽火儷人〉對非典型親密關係的揭露書寫，不純然是作家情感創傷的生命展演，而是採取顛覆男性常模經驗的女性敘事，從情感實踐所萌發的主體意識來打造自我認同。

空間產生自社會關係，故其本質上充滿了權力與象徵意義。蕭湘與「他」的關係樣態可由小說空間呈現而出：「當她剛到最下面那一級時，忽然聽到他在樓梯最上面那一級說：『You are a little bird in my cage』」（〈烽火儷人〉，頁54），「他」的發話雖不見得視蕭湘為弱勢方而是發乎愛護，但此處運用梯階與籠子的配置明顯折射兩人對關係掌控的強弱位階。初出社會的大學生蕭湘宛如長年征戰、飽歷人情老將的籠中鳥，縱然蕭湘不認為自己是籠中鳥，卻仍對此感到惶惑；另外，場景出現的公館小樓、狹小盥洗室、海濱小屋、高牆、木柵欄等具

55 黃美之，〈馬丁尼酒與野火〉，《馬丁尼酒與野火》（台北：躍昇文化，2011.10），頁24：「在我所有家人和親友的驚異中，我為禮士披上婚紗，相許攜手一生，那時台灣保守的家庭都視嫁給美國人或任何的西洋人，都是一種酒吧女的行為，……當時我的確是在衝破一道藩籬啊，也是要有勇氣的，現在想來，自己所以能那樣不顧一切嫁給禮士，只因禮士給了我一種天地遼闊的理念。」

56 爾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著，曾凡慈譯，〈第三章 團體結盟與自我認同〉，《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頁125-126。

體空間或者物件，多半映射蕭湘於情感關係中的被擠壓與負重感。這種壓抑加諸關係無法獲得穩定的失落讓不斷尋求主體意識的她，竟對自己產生極端失望甚而自殺未遂，不過也從生死邊緣中覺悟應關注自我的轉化。空間是一種生物需要，也是心理需求和精神屬性。⁵⁷ 故事尾聲已為人婦的蕭湘分別於夢境和思緒中重回小樓，這回她不再是站在最低階，而能隻身走上小樓房間，回望當年懵懂的自我，百般感懷。當年的記憶經過時空洗滌後褪去纏綿，所有過往一如主角心中倒塌的小樓般化做飄渺炊煙。作家將小樓隱喻為情感關係的場域，亦是人物心境成長的轉換過渡。

〈烽火儷人〉演繹了非典型親密關係中的自我覺察，帶領讀者走入及認識名將孫立人的私人日常，從而表現與歷史對話及記憶述說的女性作家能動性。性別之間既定的關係模式可謂被離散情境與女性主體的覺醒所打破。蕭湘（或言黃美之）經過十年牢獄後不畏道德批判與政治責難，揭露、反思自身婚外情感經歷，回溯自己的生命故事，藉此梳理國族政治和個人價值的敏感議題。其小說書寫表現冷戰語境餘生者置身離散情感、倫理價值與國族政治等壓迫下的生存創傷，並據其進行自我調節，回歸個人特異生命敘事的路徑。⁵⁸

五、結語：非典型親密關係的冷／熱戰敘事

歷史是人與現象的結合，演繹人在時空演變的因果規律。黃美之的小說提供一股解放的言說，在戰時歷史中敘說個體的生命掙扎與情感細節，建構親密關係之公共性意義。女性身體與情感經驗成為時代政治的敘事舞台，不單折射出時代環境的騷動變化、分崩離析的世俗價值，還包括當事人對自我身心狀態的覺察反思。黃美之廣泛的闡述民國戰亂下後方離散的眾生相，呈現個人生活如公眾生活般無法免除權力與時代的影響，揭露受社會結構壓迫與個人情感抑鬱的兩重困境。《沉沙》、《烽火儷人》解構了戰時離散者的生命故事，其用筆非僅為其提

57 段義孚 (Yi-Fu Tuan) 著，王志標譯，〈第五章 寬敞與擁擠〉，《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頁 46-48。

58 黃涵榆認為台灣歷史創傷的見證不應限縮於非官方、受壓迫者觀點的歷史知識建構，而需回歸個人生命軌跡本身，以重塑歷史正義。黃涵榆，〈「歷史可以被原諒，但不能遺忘」，或生命的歸零？——有關檔案、見證與記憶政治的一些哲學思考〉，《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6卷2期，頁 55-58。

出辯護、修復或浪漫想像，而是揭露生命不斷被拋除至社會邊界的裸命樣態。人物的殘缺病弱或者性格缺陷，乃表徵被歷史肢解的時代病症。本文挑戰了傳統戰爭文學的男性視角，改從女性敘事切入，探討戰爭如何影響女性的親密關係與主體性。透過戰爭遺緒中非典型親密關係的敘事構圖分析，揭示女性角色如何在家庭破碎與創傷之外，展現取代男性中心的情感重組樣態，形成戰時語境中新女性的文化表徵。黃美之短篇小說的熱戰敘事突破了女性被錨定在非戰的刻板印象與敘事傳統，女性人物不再只是國族政治的犧牲者，而能顛覆既有的政治秩序與性別規範。由此，日常生活的個人情感抉擇亦獲得政治意義，攪擾國族政治或身分認同所建構的體制化框架。

小說本就滲入作家的主觀想像，讓流動或被壓抑的經驗透過知覺架構與記憶組織獲得情節描述，推動敘事主體追尋新的意義。黃美之探索戰時離散者碎裂的生命歷程，梳理其道德、心理與情感層面的矛盾，呈示戰爭遺緒對情感關係的解構與女性主體性建構的引力。戰爭和準戰備情境所具現的約束或動員之權力規訓，強行介入大眾身心及日常生活的同時，承受規訓的一方並非消極接受，而能反動的重新組構關係、尋求主體定位。短篇小說的多位女性角色展現熱戰情境下政治犯或其眷屬的精神韌性，突破性別規範而從家庭出走自立，勾勒出戰時女性毀家去國的生命輪廓；中篇小說〈流轉〉、〈烽火儷人〉的女性主角際遇，則另面揭露抗戰後復員至國共內戰間女性被忽略的情感倫理問題。〈流轉〉的女學生不受時局與傳統婚戀規範所限，展現安居流放之中的生存哲學，勇於追求所愛與理想生活。〈烽火儷人〉的蕭湘則陷入公私領域的政治、情感困境，在家國忠誠與自身情感需求之間徘徊。此篇小說透過婚外關係的非典型親密關係，回應冷戰時期以戰為治的復員語境，如何滲透與支配女性的生涯選擇與個體情感。有別於短篇小說由家庭解構到關係重組的熱戰敘事脈絡，黃美之在中篇小說運用非典型親密關係的敘事圖式，描繪離散者的情感如何成為身分建構與主體認同的核心機制，揭示復員時期和冷戰語境下女性身體的政治化經驗與情感政治的結構性困境。

黃美之的短篇小說主要鎖定民國抗戰之熱戰語境，敘寫家庭親密關係的破與立。中篇小說擴及社會內戰和冷戰政治的女性情感故事，呈現非單偶關係中離散者的情感流動與主體覺醒，以女性聲音取代男性主導的戰爭歷史與國族記憶建

構。各式日常空間成為戰時社會關係的動態圖景和記憶容器，場景出現了家屋、宿舍、涼台、校園、小樓等棲居空間，營構戰時生活的人際場域。作家透過戰時情境中性別與權力關係的交織，刻寫以男性中心主義所建構的國族政治、經濟、文化體制之壓迫，激發並呈現女性對自我、對關係、對伴侶的重新認識。黃美之生命中戰時流散離鄉的親情疏離，戰後女青年大隊工作的國族與愛情之雙重背離，甚至 1990 年代末葉政治冤獄平反過程的煎熬，都造成她身心創傷的持續性與時空凝結。而這些創傷本質上皆關乎私人情感關係的處理，亦涉及戰爭歷史世代的集體創傷。此重層創傷的後遺效應促發她展開書寫，承擔見證傷痛及其竭力記述之後引發連鎖效應的風險。尤其〈烽火儷人〉直述了家國秩序和道德規範於私人情感場域所延續的性別壓迫和倫理約束。黃美之以戰時親密關係為敘事機關，刻劃離散者情感投射的多重向度——超越國族與原鄉，亦滲入地域空間與人際網絡。其筆下女性主體的情感流動與關係調節，不僅重構離散經驗的感知方式，更為華文離散文學的情感政治與敘事研究開拓新的分析視野。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史書美、梅家玲、廖朝陽、陳東升主編，《台灣理論關鍵詞》（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03）。
- 何春蕤主編，《性／別政治與主體形構》（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04）。
- 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著，彭仁郁譯，《恐怖的力量》（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3.05）。
- 李有成，《離散》（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13.08）。
- 李瑞騰總編輯，《2014 台灣文學年鑑》（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5.12）。
- 沈克勤，《孫立人傳》（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06）。
- 明鳳英，《她們的時代：民國女子訪談錄》（台北：釀出版，2020.01）。
- 林恩·傑米森（Lynn Jamieson）著，蔡明璋譯，《親密關係：現代社會的私人關係》（台北：群學出版社，2002.10）。
- 柯惠鈴，《民國女力：近代女權歷史的挖掘、重構與新詮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09）。
- 段義孚（Yi-Fu Tuan）著，王志標譯，《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中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02）。
- 范銘如，《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8.08）。
- 陳三井、朱宏源、吳美慧訪問，吳美慧紀錄，《女青年大隊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09）。
- 琳達·麥道威爾（Linda McDowell）著，徐苔玲、王志弘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女性主義地理學概說》（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05）。
- 黃美之，《傷痕》（台北：躍昇文化，1994.07）。
- ，《歡喜》（台北：躍昇文化，2000.04）。
- ，《深情》（台北：躍昇文化，2002.05）。
- ，《沉沙》（台北：躍昇文化，2005.03）。
- ，《烽火儷人》（台北：智庫公司，2010.06）。
- ，《馬丁尼酒與野火》（台北：躍昇文化，2011.10）。
- 爾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著，曾凡慈譯，《污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台北：群學出版社，2010.07）。

潔西卡·芬恩 (Jessica Fern) 著，柯昀青譯，《多重伴侶下的安全感：依附關係、創傷理論，與知情同意的開放式關係》(台北：麥田出版社，2023.04)。

Enloe, Cynthia. *Nimo's War, Emma's War: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the Iraq Wa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Rutherford, Jonathan. editor.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awrence & Wishart, 1990.

二、期刊論文

呂芳上，〈另一種「偽組織」：抗戰時期婚姻與家庭問題初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期(1995.08)，頁97-121。

林以正、黃金蘭，〈親密感之日常社會互動基礎：一個縱貫式的研究〉，《中華心理學刊》48卷1期(2006.03)，頁35-52。

林果顯，〈戰後台灣的戰時體制(1947-1991)〉，《臺灣風物》58卷3期(2018.09)，頁135-166。

侯作珍，〈台灣海外小說的離散書寫與身分認同的追尋——以六〇到八〇年代為探討中心〉，《文學新論》6期(2007.12)，頁27-42。

陳徵毅，〈旅居紐約名震兩岸的女作家——趙淑敏〉，《全國新書資訊月刊》150期(2011.06)，頁24-29。

游鑑明，〈處處無家處處家：中國知識女性的烽火歲月〉，《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3期(2014.06)，頁1-63。

馮品佳，〈離散的親密關係——蘇偉貞眷村小說中的感官書寫〉，《台灣文學研究學報》15期(2012.10)，頁185-204。

黃涵榆，〈「歷史可以被原諒，但不能遺忘」，或生命的歸零？——有關檔案、見證與記憶政治的一些哲學思考〉，《文山評論：文學與文化》6卷2期(2013.06)，頁53-92。

趙淑俠，〈生命是往前走的——淺談黃美之的《傷痕》和王仙的《情之鍾》〉，《明道文藝》253期(1997.04)，頁158-162。

劉人鵬，〈晚清毀家廢婚論與親密關係政治〉，《清華中文學報》5期(2011.06)，頁231-270。

三、報紙文章

朱淑珍，〈讀罷半掩卷 清淚已三行 《烽火儂人》迴響系列二〉，《旺報》，2010.06.30，C15 版。

施卓群，〈美人滄桑 將軍夢迴 《烽火儂人》迴響系列一〉，《旺報》，2010.06.29，C15 版。

張錯，〈回眸〉，《聯合報》，2012.11.16，D3 版。

喻麗清，〈夢裡花落〉，《旺報》，2010.08.17，C15 版。

趙淑敏，〈漣漪·大動盪中的不倫纏綿 筆友給黃美之的信——《烽火儂人》迴響系列〉，《旺報》，2010.08.16，C11 版。

——，〈漣漪·大動盪中的不倫纏綿 筆友給黃美之的信——《烽火儂人》迴響系列〉，《旺報》，2010.08.17，C15 版。

劉屏，〈隱藏一甲子 孫立人婚外情曝光〉，《中國時報》，2010.07.02，A12 版。

四、電子媒體

張鳳，〈思念烽火儂人 黃美之〉（來源：https://chinesewritersna.com/review/?page_id=20250，檢索日期：2024.04.24）。

叢甦，〈無常亂世中的悲喜滄桑——略評[烽火儂人]〉（來源：<https://pse.is/8udk84>，檢索日期：2024.04.24）。

